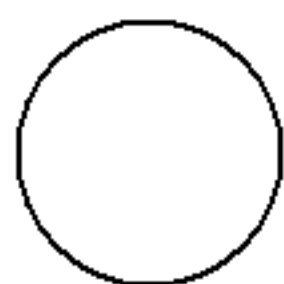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8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八期★

目 录

- 粮猪并举,互相促进本刊评论员 (1)
- 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肖 述 (4)
- 有事同群众商量林一舟 (10)
- 东日生产大队公养私养并举,发展养猪业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农村调查组
 中共新会县委员会 (14)
- 一个实行粮食生产和畜牧业并举的生产大队
赵 明 曾 源 (17)
- 人民公社工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
李成瑞 左春台 (20)
- 努力提高轻工业产品质量,满足人民需要.....陈克奇 (29)
- 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南斯拉夫农业廖 原 (35)



.



粮猪并举，互相促进

本刊評論員

本刊这一期发表了广东省崖西公社东日生产大队和河北省建明公社西铺生产大队的两篇调查材料。这两篇材料所叙述的，都是养猪业和其他饲养业同发展粮食生产互相促进的关系。两个大队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都注意相应地发展饲养业，特别是养猪业，因而就反过来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西铺大队，每头猪一年可出肥料一万几千斤，几年来养猪增多，精肥也逐年增多。肥多粮就多。东日大队一九六〇年晚造亩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养猪积肥是一个重要原因。粮食增产了，饲料增加了，就又促进了养猪业。这两个材料，同时也说明发展养猪业可以增加集体收入和社员的副业收入。

东日大队和西铺大队的材料使我们再一次看到：粮猪并举，互相促进，综合发展农村经济，确是大办农业的一种比较完善的方法。这比那种单纯地抓粮食生产而忽视饲养业，更能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中，无论从当前看，从长远看，粮食又是基础。所以办农业必须以粮为纲，也就是说，大办农业，首先是大办粮食。这是我们的一个最根本的方针。但是农业的内部构成是很复杂的，农业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发展粮食生产的经济，而是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在内的综合经济。当然，农业内部是有

分工的，各生产单位在不同条件下，经营的重点是不同的。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农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研究和了解这种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关系，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掌握农业内部的发展规律。领导农业生产，应当以粮食生产为纲，因地制宜地综合发展其他经济，实行粮食与多种经济并举，粮食与畜牧业并举的方针。这样，才能迅速地发展农业，迅速地发展粮食生产，否则，粮食生产本身的发展也要受到限制。

就粮食和畜牧业的关系来说，不发展粮食生产，不解决饲料问题，畜牧业就不可能发展；同样，不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不大力从这方面解决肥料问题，也势必延缓粮食生产的发展速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国的这个谚语也正确地说明了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的密切关系：五谷丰登为六畜兴旺提供条件，六畜兴旺又为五谷丰登提供条件，彼此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近来我们常说，猪为六畜之首。这是因为发展养猪能够最大量、最经常地提供质量最好的肥料，对发展粮食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目前我国无机化学肥料还很少，肥料来源第一还是厩肥。猪粪肥是有机肥料，它含有农作物所最需要的多量的氮、磷、钾三要素，并含有比较丰富的有机物，可以增强土壤中对植物营养有



益的微生物的活动,能培养地力和改良土壤。实践经验和科学理论证明:不能完全用无机化学肥料来代替有机肥料。即使将来化学肥料多了,也还应当尽可能地增加厩肥。厩肥和无机化学肥料混合使用,才更有利于土壤的改良和农作物的增产。我们切实地认真地执行粮猪并举的方针,一方面可以使粮食生产有可靠的肥料基地,另一方面可以使养猪业的发展有巩固的饲料基地,这样就能够促进粮猪两项都大大地发展。而且,养猪还可以提供肉食,提供轻工业生产的原料,无论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很多好处。

一般说来,各个农村人民公社、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具有实行粮猪并举的不同的潜在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有正确的领导和其他适当的措施。就领导来说,发展养猪业的关键,在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公养私养并举、而以私养为主的方针。目前,在大多数农村,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发动社员养猪的积极性,普遍地组织社员养猪,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当然也应当积极地逐步地发展集体养猪。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五年在批发浙江省一个合作社的材料时,就指示:“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少数禁止养猪的民族地区当然不在此内)首先做到每户养一头猪,然后争取每户养二头猪,这是我们几年内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应当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应当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社员家庭副业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一切可能的地方,社员家庭养猪应当

成为其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员家庭养猪有许多方便条件。农民原有的养猪经验和设备可以发挥利用,而且分散饲养比较容易管理好,管理简便,能减少疫病传染,可以充分发挥辅助劳力和零星资源的作用,成本比较低。只要发动社员积极性,并提供适当的条件,就能使养猪业在短期内大量发展,这样能较迅速地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还应当看到,在集体经济条件下的私养和个体经济条件下的私养,是有所不同的。社员的收入主要来自集体经济,包括养猪在内的家庭副业只是社员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私人养猪,受益的不仅是社员个人生活,在生产上受益的,主要是集体经济。社员积极积肥并把肥料卖给集体(生产队应尽可能把社员家庭积肥,纳入自己的总的积肥计划之内),就是对于集体生产的贡献。社员家庭养猪和集体经济这两者的关系,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只看到一致的方面不看到矛盾的方面是不对的,只看到矛盾的方面不看到一致的方面也是不对的。我们领导的任务,是要采取适当的办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两者的关系更好地一致起来。公私并举是我们发展养猪业的长期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即使将来公养部分在整个养猪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全国社员养猪的数量也还应当尽可能地增加。因此,在领导上来说,不能只顾公养而不顾私养,也不能只顾私养而不顾公养。在目前则必须用大力提倡和领导社员家庭养猪,发掘私养的潜力,并且切实解决在发展社员家庭养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全面地发展养猪业，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业，不是泛泛地只做一般号召或空发议论所能够解决问题的。东日大队和西铺大队同志们的可贵处，是他们不仅较早地懂得必须正确地执行这一方针，并且在鼓励社员家庭养猪方面，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主要的是：（一）搞杂粮生产，种可作饲料的高产作物（如番薯），以保证猪的饲料。这是发展养猪业的根本问题。两个大队的经验都是，杂粮增多了，饲料多了，猪也可以养得多。为了帮助社员养猪，生产队还给社员配售饲料，并提供其他各种方便。（二）为了解决饲料问题，使社员在不妨碍集体劳动的条件下，有可能种好自留地。并且很好地安排集体劳动的时间，执行放假制度，使社员有时间从事家庭副业。（三）帮助社员解决猪仔问题。东日大队一九六〇年为私养和食堂养猪提供了七百八十多只猪仔，满足了社员的需要。（四）按照规定向社员收购肥料，合理作价，按质论价，按期付款。（五）社员出售肥猪，适当留肉，多养猪多吃肉。（六）实行免费防疫制度。采取这些措施，对于发动社员家庭养猪起了很好的作用。一般说来，各个公社、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根据本地情况适当采用这些措施。为着鼓励农民养猪，国家自然也要考虑进一步合理地解决收购价格和饲料供应等问题。

在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必须积极地逐步地发展集体养猪事业。集体养猪代表着养猪业的伟大前途。但是，各地经验和这两个大队的材料都证明，集体养猪事业只能而且必须根据实际可能条件，逐步地发展。目前不少地方还缺乏大量集体

养猪的经验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养好一批发展一批。在目前一般情况下，集体养猪应该以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和食堂为主，集体养猪的规模应该以小型为主，决不能不顾条件是否具备，主观地盲目地想多就多，想大就大。必须根据设备的逐步改善，饲料的逐渐增多，科学管理经验的积累，饲养责任制度的健全，卫生防疫力量的增强等等条件，使集体养猪的数量从少到多，使集体猪场的规模从小到大。东日大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可供那些有条件发展集体养猪的地方作参考。

从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在调整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技术改造，进行整风整社，坚持和巩固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等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使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能够更好地适应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适应整个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东日大队和西铺大队两篇材料所提供的粮猪并举，互相促进的经验，也证明发展养猪是增产粮食、发展农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只要我们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抓紧发展养猪业，发展饲养业，就能够更好地持续地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是宝中之宝，大办粮食是全党全民共同的光荣任务。我们相信，贯彻执行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我们一定能够争取今年粮食生产的好收成，并且逐步地使粮食生产和整个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

肖 述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我們办任何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办，如何办，都須看实际条件而定，要經過調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時間、地点、条件解决問題。

要不要注意研究客观条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答复从来是肯定的。人們能够自觉地为自己的行动規定某种任务和目的，并为实现这种任务和目的而进行斗争，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我們革命工作者当然必須十分重視人的主观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① 我們在实际行动中为自己規定某項任务、某种目的并为此而奋斗，无非是为着促使某种事物的轉化，使某种可能性轉变为现实，例如，使某項計劃轉变为实际，使农作物由低产变为高产，使落后变为先进，使我們的工作由这一步进到那一步，等等。要实现这种轉变，不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不行的。

毛澤东同志說：“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

互相斗争的結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轉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轉化。”^② 客观地分析现实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掌握为实现好的可能性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这是科学的任务，也是领导的任务。

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我們一方面要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的雄心壮志，一方面又必須脚踏实地，把自己当前的一切行动計劃、任务，建筑在实际可能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筑在抽象可能或虛假可能的基礎之上。办一切事情，要考虑需要和可能两方面，不能只顾需要而不顾可能，不能以主观願望代替对于实际条件的估量。虽然一切合乎規律的可能性或迟或早要轉变为现实，但它們的轉变总須依賴于各种必要条件的成熟。正确的任务就是符合于群众的需要，并有必要的客观根据的任务。人們的行动总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必須

^① 《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頁。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頁。



願到客观条件的許可，不能超越客观条件所許可的限度去期求事情的成功。以征服自然为例。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从总的发展趋势來說，从人类世世代代的长过程來說，是无限的，发展生产的可能性，增产的潛力是无穷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阶段，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增产的可能性和潛力，又是有限的。在任何条件下，生产的增长都不能不受任何限制。当我们的生产达到某种程度时，为要突破限制，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条件，創造新的条件。只有新的条件被不断創造出来，增产的可能性才能随之不断增大。又如，我們领导任何一項运动，干部的力量和群众的觉悟程度，都是重要的条件。毛澤东同志屢次向我们指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既不可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違反群众自願的原则，也不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違反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

每个地区都是全局的一部分，都有基本相同的东西，有共同的一般的規律性，或者叫做共性，因此就能提出和規定一般的原则、总的方針、共同的任务。但各个地区又有不同的个性，它們之間存在着具体条件上的許多差別，因此在把一般原则、总的方針应用到不同的具体条件下的时候，步驟、方法、形式等就应有所不同。这就是，要使原則性和灵活性相統一，因时因地制宜。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別很大，不論在革命中或建設中，每个地区在貫徹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的时候，必須注意当地的具体条件，按不同地区的

不同条件，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方法。党的路綫和政策是以全面的形势为依据而制定出来的，如果背离了党的路綫和政策，工作就会犯錯誤；但要真正地，而不是形式上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又必須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否則也要犯錯誤。

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在《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一文中，曾以陝北地区农业工作为例來說明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深入調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時間、地点、条件解决問題的道理。他說：“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時間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例如警备区沒有荒地(除清澗有少数)，耕地不能扩大；羊子为牧地限制，发展有限；运盐又缺乏驮牲；减租政策又未彻底；因此，那里的粮食沒有增产，副业除紡織外亦未发展。但是多鋤草、多施肥、多犁地的深耕(改良作法)办法，虽在那里早已实行，也还應該根据现状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尽可能的增产。但是这种办法，若拿在土地多、人口少、作法粗的区域去用，便少实效。因为这些办法都要增加劳动力。在后一种地区的农民看来，深耕不如多种地，多施肥不如多开荒；尤其在雨水少的区域，多种地是較強的。所以改良农作法的口号，現時在后一种区域一般是少实效的。在这些区域，目前真正增加产量，最主要的还是靠开荒。”由此，毛澤东同志指出：“我們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間要有分別，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



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①

各个地区应当互相学习经验，应当按照自己的条件推广先进经验。由于各地的条件千差万别，有些事情在甲地能够办或者能够这样办，在乙地未必能办或者未必能完全照这样办。在介绍一项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弄清楚当时当地的条件，说明这些条件对于它的成就起了什么作用，说明主观努力是在什么条件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而不能只是笼统地讲述成果，不分析该项经验产生的具体条件。在学习和利用别人经验的时候，必须注意本地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如果简单地抄袭，就容易弄出错误。

曾有人以为，如果我们讲客观条件，就会妨碍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们把重视条件和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什么是主观能动性？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由此可见，我们要发扬这样的自觉的能动性，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估量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采取行动。

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创造历史，这就是说，人们能够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并在

这个基础上，依托现存条件，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和任务而努力。在一种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以前，由于事物的矛盾规律，事物的发展往往有诸种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有好的可能性，也有坏的可能性，它们是由许多互相矛盾的条件支持着的。这些条件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对于实现我们所要争取的可能性来说，有的发生有利作用，有的发生不利作用。对于这些条件，我们必须客观地而且全面地认识它们，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变化发展的趋向，这也就是所谓观察形势。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运用并创造有利条件，克服或限制不利条件，或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这就是排除实现坏的可能性，争取实现好的可能性，使形势变得对我们完全有利。不仅如此，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限于眼前的任务，而且还展望到将来。我们是“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③的人，所以在实现当前的任务中，还应当积极地为下一步任务准备条件。我们对于客观条件和形势认识得愈好，估计得愈正确，我们也就愈能驾驭这些客观条件，愈能获得主动权，从而能够最有效地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就是毛泽东同

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解放社1944年订正再版，第18—19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页。

③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40页。



志所說的，人們必須把自己活動的舞台建築在認識客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允許的基礎之上，建築在既定的物質基礎之上，凭借這個舞台，充分發揮主觀能动性，就可以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

我們對於主觀能动性的作用的了解，如果超過上述的意義，例如把它了解為我們的活動可以脫離既成的條件，人們可以在不具備必要條件和一定的物質基礎的情形下，任意地規定和實現某種任務，或者把僅在將來有可能實現的任務，勉強地放到現時來做，那是不正確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脫離開客觀條件，忘記我們活動的舞台必須以一定的客觀物質條件作基礎，我們只能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就談不到正確地發揮主觀能动性。

所以，採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重視客觀條件，不僅不會妨礙人們主觀能动性的發揮，恰恰相反，重視客觀條件正是為着正確地和真正有效地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动性，前者是後者所不可少的一個前提。

但是，事實上，確實也有人在重視客觀條件的借口下因循敷衍，對實踐採取消極態度。應該指出，在這種情形下，主觀能动性之所以不能發揚，並不是因為他們重視了客觀條件的緣故，而是因為他們以一種不正確的態度、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對待客觀條件的緣故。客觀條件中有對我們的工作有利的條件，又有對我們工作不利的條件；他們却往往只看到不利的條件，而看不到有利

的條件。在我們的工作中，許多客觀條件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可變的、暫時的；但他們只是在某種條件已經完全出現的時候，才能看到它，而當它正在生長、興起的時候，却視而不見。他們名義上重視客觀條件，其實並沒有對於客觀條件進行科學的全面分析。

如果不承認客觀條件，以為提出一種任務，進行一種工作，不需要估計客觀條件，那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如果以為人的行動只能消極地適應客觀條件，以為只有在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而沒有任何不利條件的時候，才能提出某種任務，進行某種工作，這種觀點只是使人放棄了主觀努力，當然也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如果放棄了主觀努力，那就不但不能夠改造實際，而且也不能夠認識實際。要科學地、全面地認識各種客觀條件，了解其作用和相互關係，是要經過一番努力的，為此就要進行調查研究，就要在實踐中取得經驗。沒有這種努力，是得不到正確認識的。我們根據已經存在或者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某些客觀條件，提出一項任務，並不是說，為最後實現這一任務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都已完全具備了。有沒有客觀根據提出某項任務，這是一回事；在某項任務提出以後，爭取任務的實現，使可能變為現實，這又是一回事。爭取任務的實現，就是依據現存條件，加上主觀努力，逐步創造出為實現這一任務所必要的一切條件，使可能趨勢變為事實。所以實現任務的過程，



同时又是依靠主观努力进一步认识条件和创造新的条件的过程。

以军事为例。在军事上，我们提出战略反攻的任务，是因为就全局说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已经存在，战胜敌人的实际可能已经存在，但反攻任务的提出，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胜利，敌人已经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反攻的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发展和继续创造新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例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军是在力量已大为增强，并已争取到粉碎敌之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迫使敌人转入防御的条件下，提出反攻任务的。我们的最后胜利，是依托了上述的条件，积极发挥主观努力，采取“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①的正确方针，实行决战，不断创造新的条件，克服种种困难，而争取得来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②。“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极高地、同时也是最恰当地评价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主观作用，也正表

现在它能为获取胜利继续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革命工作一般总是要求我们在比较差的条件下，积极创造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做出成绩，夺取胜利。革命不是坐享现成的有利条件。我们革命的胜利，大家知道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轻而易举。毛泽东同志曾经着重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④。我们有使我国变成富强的实际可能，但要达到这一目标，仍需要我们发挥极大的主观努力，采取多快好省的正确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不断地探索和创造新的条件。例如工业战线上的持续跃进，在目前需要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去继续创造条件。其他战线上也是这样。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办成事情的。但也应当承认，人们如果能够高度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那末即使在比较差的物质条件下，也能够做

①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29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468页。

③ 同上书，第476页。

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出比较好的成绩来。我们有許多工作单位和生产单位，在主观努力方面做出了好的榜样。如有些农村人民公社或生产队的土地贫瘠，又受了几年大灾荒的影响，客观条件对他们并不利，但他们能够根据情况，想尽一切办法，多种杂粮、蔬菜，大力发展副业和畜牧业，做到了扩大生产，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这是因为他们尽可能排除了对他们不利的客观条件，而发掘了对他们有利的客观条件。有些工厂面临着原料材料数量不足、质量差的困难，他们正视这些困难，但不被这些困难所吓倒，而是承认困难，如实地分析困难，认清这是总的大好形势下的暂时性的困难，充分发挥主观作用，发动群众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向困难作斗争，结果还是达到了可能达到的优质高产低消耗的目的，克服了实际上可以克服的困难。

事实证明：实际存在着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往往不是人们一看就能认识，也不是不经努力就能利用的。有些粗看起来似乎难以做到的事情，只要我们鼓足干劲，努力发掘和利用有利条件，尽力去做，就能够做到；反之，有些实际可能的事情，如果畏难松劲，不努力发掘和利用有利条件，不尽力去做，则本来可能办到的事情也会办不到。在一些条件大体相同或相差不多的生产单位，其生产结果不同，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凡是能够切实地适当地估量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按照实际条件办事，并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就能够把工作做好。

反之，不按实际情况办事，或者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或多或少具有畏难松劲情绪的，工作就做不好。

过高地估量事情的可能性，规定一些缺乏实际可能条件的任务和指标，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不从实际出发、不顾实际条件的表现；但过低地估量事情的可能性，看不到或者不努力去发掘和利用那些实际存在着的有利条件，对于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也认为做不到，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这也是一种不从实际出发、不顾实际条件的表现。犯后一种毛病的人，往往在口头上说他们是重视条件的，但实际上他们正像前面所说的，只是片面地看到某些不利的条件，忽视实际存在着的有利条件，以及不懂得现成条件是能够由人们的主观努力而变动和发展的。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条件是不不断变化的。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新的现实就又提供给事物以新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事物具备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新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就又须去认识它们、掌握它们，以便据此提出新的任务，为达到新的目标而进行新的主观努力。这样的过程是不断的。因此，经常调查研究现实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掌握变化着的各种现实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为着夺取一个一个的胜利，正确地充分地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所需要经常注意的十分重要的事情。



有事同群众商量

·林一舟·

最近一个时期，各地许多农村人民公社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对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这对于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争取今年农业生产的丰收，有重大的意义。各地的经验毫无例外地证明，要把农村工作领导好，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同群众商量。

有事同群众商量，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精神。毛泽东同志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是我们党的一切正确的政策、办法、措施产生的源泉；我们工作中的任何正确的领导意见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领导人单凭自己脑子想出来的，而是在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不断集中群众的各种具体意见和经验逐步形成的。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做好，决定的关键并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能不能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只要肯事事同群众商量，重视和学习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只是关在房子里叹自己能力小，办法少，而不去同群众商量。其实，只要走出房子，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求教，头脑就会聪明，思路就会灵活，眼睛就会明亮。事

情常常是这样：当我们出去时脑子是空的，回来时却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意见和材料；有些困难问题，自己脑子里想不通，一旦同群众商量，便迎刃而解，豁然贯通了。

一切革命和建设的事業，都是靠群众的双手来进行的。干部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遇事同群众商量，群众的主人翁的责任感才会不断增强；干部提出的主张和办法必须得到群众的同意，才会变成群众的积极行动。有的社员说：“工作布置得合我们的心意，越干越有劲。”有的基层干部说：“非得让群众真正思想通了，从肺腑里说出同意的话来，事情才真正好办。”“光是我们干部拿出一套办法来号召群众去干，就算这些办法都很好，总还有社员一时了解不到，干起来总不像了解得透的人那么带劲。大家讨论以后，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牢牢挂在心上，干起来都是自觉自愿的，就一定能干好。”所有这些都说明，同群众商量是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一把钥匙。

我们党从来认为，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要领导群众前进，就要密切联系群众，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就要把工作任务和党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2页。



的政策向群众交代得清清楚楚，对群众作耐心的宣传动员和说服教育工作；就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我们的多数干部，由于树立了群众观点，摆正了自己与群众的关系，能够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倾听群众意见。许多同志已经养成了同群众商量问题的习惯，凡是应该同群众商量、经过群众讨论的事情，如果不同群众商量、不经过群众讨论，心里就感到不安，感到对党对群众没有尽到责任。他们愈是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愈是尊重领导，主动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因此领导工作也就愈好做，愈容易保持正确。也有少数同志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由于他们的群众观点不强，自以为比群众懂得多，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在领导工作中出的主意就常常不能符合实际需要，在群众中行不通。有的同志甚至把一些行不通的办法硬叫群众实行，把一些群众不愿办的事情勉强群众去办。这样他们就不但不能做好工作，而且往往把事情办坏了。

我们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遇事同群众商量，我们的工作就能符合于实际情况。拿农业生产来说，从当地的实际生产条件出发，贯彻因地、因时、因作物制宜的原则，是很重要的。要做到因地制宜，就要掌握当地的土质、地力、水利等条件。要做到因时制宜，就要掌握当地的气候条件，掌握节令和天气演变的规律。要做到因作物制宜，就要认识和掌握各种作物及其各个品种的生长规律。谁最熟悉当地的“天时”“地

利”等自然条件和劳力、畜力、农具等生产条件？谁最了解当地各项农作物的具体的生长规律？无疑地是常年累月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民群众。他们在本乡本土长期的生产斗争中，摸熟了各种自然条件，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群众的经验，是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要依据。例如，作物种植的合理安排，是关系生产的全局、对增产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要使各种作物安排得当，决不只是依靠少数干部能够办得到的，必须同群众反复商量。作物种植面积的安排，主要是决定于当地的土质、气候、茬口等自然条件和水利、肥料、劳力、畜力等生产条件，决定于当地的耕作经验、生产习惯和各方面的实际需要。有些地方土质有几种以至十几种类型，安排作物和采用技术措施，就必须适应不同土质的要求。有些作物种在这里、接这种茬口产量高，种在那里、接那种茬口产量就可能低；有些作物粮食产量不一定很高，但它的秸秆产量高，是牲口的好饲料，做饭的好烧柴，副业生产的好原料。农业生产既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满足国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又要满足当地人民生活（包括粗细粮搭配、品种调剂、烧柴等等）的需要，既要满足牲畜饲料的需要，又要满足经营副业生产的某些原料的需要。要使各种作物的种植安排得当，干部必须同最熟悉当地生产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群众反复商量，共同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而避免顾此失彼的主观片面性。事实证明，凡是在种植上做



到因地因时制宜、增产多的地方，从领导上来说，大都是那里的干部同群众商量得好；凡是种植不合理、增产少的地方，大都是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商量较少或者没有和群众商量。

有些同志对一般的工作能够做到同群众商量，但是在推行新技术、新经验的时候，往往不大愿意同群众商量，认为同群众商量会不利于这些工作的迅速开展。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同意，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才能迅速地开展，收到良好的效果，那末，推行新技术、新经验的工作，就尤其是如此。为了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积极推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增产经验是必要的。广大群众对于确实有助于增产的技术措施和先进经验，也都是愿意接受的。但是，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不完全相同，而农业生产又有强烈的季节性，“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在重要的环节上措施失当，往往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群众对于新的技术措施和增产经验的推行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采用任何一项新的技术措施，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弄清楚是否适合当地需要，是否具备推行这种技术措施的各种条件。有些技术措施，虽然在别的地方已经试验成功，但是在本地推行还没有把握，那就要同群众一起进行适当的试验。有些技术措施在本地推行，虽然还缺乏某些条件，但只要群众愿意采取，他们就会积极地创造条件，来加以实现。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

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又说：“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完全适用于农业生产中推广新的技术措施和先进经验的工作。

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也懂得同别人商量，但往往只限于周围的少数积极分子。同积极分子商量是完全必要的，积极分子的意见能够反映群众的要求，但是也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许多事情上要得出全面的、合乎实际的主张，不只要同积极分子商量，还要同广大群众商量。一个正确的主张，如果只是少数积极分子理解和接受，还是不能贯彻执行，必须为群众的大多数所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我们在工作中，要启发群众的自觉，主要地就是要注意启发那些处于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

有些同志不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在同群众商量工作、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完全

^①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0页。



没有不同意见出现，倒是使人奇怪的。群众不是清一色的。由于知识和经验的水平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对同一件事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出现，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当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有了不同的意见，群众和领导就可以把各种不同意见加以比较，比来比去，就会肯定出一种为大家所共同承认的、或多数人所承认的意见；这种意见往往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不同意见的出现，批评意见的出现，对于我们全面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对于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是应当热情欢迎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①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应该养成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与自己相反的意见和批评意见的习惯。如果不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很难做到全面地观察问题，很难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加以改正。当然，群众的有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应该经过分析，对于确实是错误的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改正，不能跟着错误的意见走。有事同群众商量，这是干部自我教育的方法，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

这几年来，各地农村工作干部已经创造了許多同群众商量的有效形式。有些同志为了解决工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经常召开有

经验的老农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座谈会，征求意见，进行讨论。有些同志聘请一些有生产经验的老农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作指导生产的参谋和顾问，经常向他们请教，并通过他们了解群众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很多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贫农、下中农中交了許多知心朋友，工作中、生产中的问题随时同他们商量，他们也主动地帮助干部出主意，想办法。这些做法，对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认真坚持下去。

健全人民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是干部贯彻有事同群众商量这一原则的最重要的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生产队社员大会，是公社各级讨论和决定重大事情的权力机关。定期开好这些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同群众一起正确地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强调地指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为了把工作作好，一定要实行高度的民主，一定要有事同群众商量，忠实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志。”这一指示，是做好人民公社工作的指南。认真执行这一指示，就能够经常保持正确的领导，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促进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①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3页。



东日生产大队公养私养并举，发展养猪业

中共广东省委农村调查组

广东省新会县崖西人民公社东日生产大队，近两年来由于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公养私养并举的养猪方针，无论大队、生产队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养猪，都取得显著成绩，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增加社员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东日生产大队共有五百九十七户，两千二百五十八人，耕地五千七百一十六亩。这个生产大队的社员历来就有养猪的习惯，对养猪很重视。他们说：“秀才望考试，农民望养猪。”“有猪就有肥，有肥就有粮。”“家里养头猪，利用朝头晚尾，不用花费好多工夫，一年就能收入几十元。”但是过去曾有一个短时期，没有认真执行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在尚未创造必要条件和缺乏集体养猪经验的情况下，盲目搞“千头猪场”，对社员家庭养猪不加鼓励和帮助，结果影响了养猪业的发展。后来，他们及时吸取了教训，全面地执行了公养私养同时并举的方针，一

面继续巩固和发展大队和生产队集体养猪，一面大力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养猪，不到两年，就使全大队养猪事业的面貌一新，不但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水平，而且有了更大的发展。

为了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养猪，大队按

规定保证社员每月有几天的假日，收购肥猪时给养猪户留下一定数量的肉吃，强调干部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带头养猪。除了这些以外，大队还集中力量帮助社员解决两大问题：

一是帮助社员解决猪仔问题。大队规定，凡大队猪场百斤以下的猪，社员可以随意挑选赶回家去喂养，一律不收现款，等把猪养肥卖出后再还猪仔本。猪场卖给食堂和社员的猪仔，一九五九年有三百三十四头，一九六〇年有七百八十二头。最近，大队还准备再卖给食堂和社员四百五十头。这样，就基本上满足了生产队食堂和社员家庭养猪的需要。

二是帮助社员解决猪饲料问题。经过调整，现在社员有自留地共二百三十多亩，加上私人少量开荒，平均每户有六分地。这些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种植猪饲料。各食堂除有大队拨给的饲料地六十四亩以外，还开荒一百六十八亩，主要也是种植猪饲料。公社和大队对社员家庭养猪还分配给一定数量的番薯和米糠等饲料。为了彻底解决猪的饲料，大队在大办粮食中，狠狠地抓杂粮主要是番薯的生产。一九五九年全大队杂粮种植面积二千零九十亩，产量达三万一千三百五十担，一九六〇年扩大到二千八百四十三亩，产量达四万二千六百多担。这样既补充了人的口粮，又从根本上保证了猪饲料和大牲畜饲料。去年每头猪平均有番薯四、五百斤，薯苗二十担。

由于大队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的办法，社员对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信心很足。他们说：“这里养猪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大队有猪仔，二是喂猪有饲料，三是喂猪有时间。”

东日生产大队在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养猪的同时，还积极地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办



好集体养猪场。他们认真地吸取了过去不顾条件盲目办大猪场的教训，经过整顿和建设，逐步由小到大，使猪场得到巩固和提高。两年来，大队集体养猪场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批商品猪，而且给食堂和社员养猪提供了大量猪仔和其他许多方便，为实行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创造了条件。两年期间，猪的死亡现象大大减少，一九六〇年一百八十头母猪无一死亡，猪仔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养猪的纯收入共达一万六千三百元。

东日大队举办集体猪场的主要经验是：

首先，集体养猪一定要有条件，从小到大，逐步扩充。最好先养少量的母猪，以便取得经验，掌握技术，再一步一步地扩展。同时，要明确大队集体养猪场的任务，除了逐步饲养部分肉猪，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猪以外，还要注意饲养母猪和种公猪，繁殖猪仔，为生产队食堂和社员养猪提供猪仔。

其次，集体养猪一定要加强领导，建立专业队伍。大队派出副总支书记李胃厚专职领导猪场工作，并选派了三名共产党员、四名共青团员到猪场工作，饲养员也都是经过挑选的贫农、下中农社员。猪场有三个场长，他们分管饲料、饲养、肥料三方面的工作。下面又组成若干个专业小组。此外，还选出两个青年和一个老农当技术员，他们自学技术，买书看，到外地学习，现已初步掌握了一套防治猪病的技术，去年一年用针灸治好了七十四头母猪的气喘病，又给社员治好了一百多头病猪，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了猪的死亡。猪场用药也多是自己上山采集的，去年为大队节约药费二百多元，现在尚存土药十多担。

第三，集体养猪必须建立责任制。他们针对过去猪场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制订

了分栏、分群、分工管理的责任制，带仔母猪要分栏，大小肉猪要分群，分别编排猪舍，固定专人饲养。同时，实行“三包、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和定人员、定饲料、定产量、定工分。关于定人员，全场人员中，分担饲养的八人，种饲料和割青饲料的二十人，煮饲料的四人，割柴草的六人，种菜的三人，积肥的二人，管伙食的二人，技术员三人。关于定饲料，目前规定一头母猪每天喂青饲料五斤、番薯四斤半、米糠一斤、稻谷三两，另外每产一胎猪仔加营养费一元。一头猪仔每天喂番薯一斤、米糠四两、稻谷四两，一直喂到六十天。一头公猪或一头肉猪每天的饲料也作了类似规定。关于定产量，根据上述分工和固定的饲料，饲养员要保证将每头猪只喂饱、养大、养肥。新老母猪每年包产一胎半，猪仔九十天后出售，每只重十二斤。后备母猪每年包产一胎，猪仔九十天后出售，每只重八斤。肉猪从十五斤起包养一年重达一百三十五斤。关于定工分，管好一头母猪每天工分四厘，后备母猪和肉猪工分二厘，公猪工分六厘，猪仔工分一厘。此外，还规定了定期搞清洁卫生和每天汇报猪只生长情况的制度。猪场建立了一套经营管理制度，成立了场委会，每十天召开一次场员大会，中心议题是：第一检查猪只生长情况，第二检查饲料供应，第三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两年来一直坚持了这一制度。为了巩固上述“三包、四固定”制度，他们还实行月月评和“三全奖”。“三全”是全产、全活、全壮。每个月由领导干部和场员共同进行民主评比。小猪全活奖（成活）一般一月一次，大猪全产奖、全壮奖（母猪安全生产、猪只生长达到规定重量）和超产奖一般一年一次。一九六〇年发



奖金五百多元，最多的得到二十六元，最少的也得到六元。实行这一制度对于激发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完成养猪任务，尤其是提高猪仔成活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集体养猪要准备足够的饲料。除了大队每年供应三万斤饲料谷以外，猪场还建立了自己的饲料基地，开荒一百七十五亩，生产了大批番薯，再加上割青饲料，便保证了全场五百多头猪只常年不缺饲料，并为大队节约了饲料款六千多元。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东日生产大队集体养猪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已经初步摸索了一套集体养猪的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发展集体养猪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日大队由于执行了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一九六〇年养猪头数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点三倍，存栏数增长二点一五倍。大队猪场养猪五百二十七头，食堂养猪二百九十五头，社员养猪七百一十六头。三项合计共一千五百三十八头。平均每人有猪零头六八头。同时鸡鸭鹅也有较大发展。历年生猪和鸡鸭鹅的发展情况如下：

生猪发展情况

	饲养数 (头)	平均每户 (头)	存栏数 (头)	平均每户 (头)
1957年	658	1.1	370	0.6
1958年	714	1.2	365	0.6
1959年	1,124	1.9	690	1.2
1960年	1,538	2.6	1,169	2.0

鸡鸭鹅发展情况

	饲养数 (只)	平均每户 (只)	存栏数 (只)	平均每户 (只)
1957年	9,819	16	4,831	8
1958年	12,341	21	5,101	9
1959年	13,734	23	3,785	7
1960年	24,183	41	8,170	14

东日大队一九六〇年为国家提供了三百六十三头商品猪(扣除留肉部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出售鸡鸭鹅九千三百多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三。

养猪多，积肥多，便大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一九六〇年积猪屎尿肥一万九千八百多担，全大队平均每亩稻田施精肥十担(今年每亩可达十五担)，其中猪肥占百分之五十。该年晚造亩产平均三百四十四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养猪积肥推动了冬种作物的生产，去年播种面积达二千九百三十六亩，比往年增加一倍多。这些冬种作物都是用猪肥作基肥和追肥的。由于肥源充足，社员对争取今年粮食丰收更加充满了信心。

随着养猪事业的发展，社员的收入显著增加了。一九六〇年卖给国家生猪得到五万多元，平均每户八十多元。社员卖给大队肥料得到九千多元，平均每户十五元多。社员家庭副业，主要是养猪、养鸡鸭鹅，平均每户收入九十七元，占社员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社员养猪解决了不少问题，第二生产队长李业付说：“我去年养猪收入七十多元，交了三个孩子的学费、买棉胎一张、棉衣一件，还有几十元零花钱，又领了不少的肉票。”今年过春节，大队准备了大量的猪肉、腊鸭和现款分配给社员。

现在，东日大队计划今年养猪达到三千头，其中，集体养一千二百头(主要是繁殖猪仔)，食堂养六百头，社员家庭养一千二百头。为了更快地繁殖猪仔，大队还准备从猪场拨出四十五头母猪分给社员公私合养。东日大队的养猪事业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一个实行粮食生产和 畜牧业并举的生产大队

赵明 會源

西鋪生产大队，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也就是原来王国藩领导二十三户贫农办“穷棒子社”的那个西鋪村。全大队有一百七十四户，八百一十二人，参加本大队劳动的劳动力二百六十八人，耕地一千四百四十五亩。这个大队由合作化时期到现在，粮食产量一直稳步上升，同时，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西鋪生产大队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近几年来都是逐年上升的。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面积和劳动力虽然由于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其他生产而逐年有些减少，但是粮食总产量仍然在稳定地增长。下面是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逐年增长情况：

年份	单位面积产量(斤)	总产量(斤)
1956年	380	491,938
1957年	409	573,242
1958年	476	566,977
1959年	557	573,664
1960年	605	622,944

西鋪村原来是个缺粮村，每年要由国家供应几万斤粮食。由于粮食产量逐年增多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变为余粮村，此后年年超额完成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

粮食多了，社员的生活改善了，人口也很兴旺。该村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每年每人有口粮四百斤左右，每户还都有三、四百斤的储备粮。去年由于遭灾，口粮标准降低些，但是仍然比一般生产大队高，队里还有五万四千多斤储备粮，蔬菜也比较多。这里年年添人进口，一九五三年全村只有六百三十四人，一九六〇年增加到八百一十二人。

西鋪生产大队粮食产量逐年稳步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畜牧业有较快的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了起来，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生产更快地发展。下面是畜牧业逐年发展的情况：

年份	猪饲养数*	羊存栏数	牛 驴存栏数	骡 馬存栏数
1953年	217	45	25	1
1954年	275	96	38	3
1955年	339	98	49	3
1956年	370	100	52	4
1957年	395	120	55	5
1958年	420	119(外調6)	57	5
1959年	445	135	70	4
1960年	470	156	66	4
1961年**	315	177	65	5

* 包括存栏数、卖出数和食用数

** 根据1961年2月统计的数字

由于畜牧业发展了，特别是猪多了，肥料增加得很快。全村耕地每亩平均施肥量，



在个体生产时期約有一千五百斤，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增加到三、四千斤，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增至五、六千斤，一九六〇年增至七千斤左右，一九六一年春耕前已送到地里的肥料每亩約有五千斤，預計全年可达八千斤左右。西鋪生产大队的干部和社員对积肥工作都十分重視，他們有一套成功的积肥經驗。生产队定期帮助各戶猪圈垫土、起粪，每头猪每年平均出肥一万五千斤。生产队还在山脚盖起了六个大牛圈，夏天不用牛的几个月，把牛放养在这里，并且組織劳动力抽空上山割回大量荆条(很好的綠肥)放在牛圈里，經過牛踩踏后出的肥料又黑又臭。这样造肥多，又节省运输力。据干部們計算，一头牛每年可以积肥五万斤左右。

肥料多了怎么运呢？他們在积肥时尽量注意縮短运肥路程，他們还注意繁殖大牲畜和添車买馬。全大队現有的大牲口已經比个体經濟时期增加一点六倍多，今年又买了一匹馬。近几年車輛也增加了，一九五九年能运粪的有三辆胶皮車和五、六辆铁車，現在有六辆胶皮車、四辆小胶車和二辆铁車，能够保证把大量肥料运到地里。

这里是个山区，百分之八十是梯田，原来土质瘠薄，大部分田地的土层只有三、五寸厚，下面是石子。数年来，由于施肥多，改良土壤，进行水土保持，土质变肥了，土色变黑了，土层变厚了。这个大队有一块山坡地，个体生产时期每亩只收七十斤苞米，后来由于施粪多，一九六〇年每亩收五百多斤。地里使用的廐肥多了，粮食产量高，生产成本随着降低了，一九六〇年农业生产費用仅占农业收入百分之十九点七，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五点四。这主要是因为用土肥多，用化肥少，

土肥便宜，所以生产費用减少了。王国藩对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的关系，对土肥和化肥的关系体会很深，他說，“在我們这里，要想增产粮食，不发展畜牧业不行；別說現在国家还不能大量供应化肥，需要自己积肥；就是有了化肥，沒有廐肥結合使用，化肥也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們一直坚持以土肥为主。”

西鋪生产大队养猪业逐年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一直坚持了党的公养和私养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这个大队养猪业发展很快。近两年虽然由于自然災害的影响，猪飼料有些减少，但是他們积极想办法解决猪飼料問題，猪的飼养数仍然沒有减少。下面是这个大队历年猪只发展的情况：

年份	存栏数			母猪(适龄母猪)			公猪 公养
	合計	公养	私养	合計	公养	私养	
1953年	127	2	125	7	1	6	
1955年	249	16	233	21	7	14	
1957年	280	40	240	29	14	15	1
1958年	300	60	240	31	12	19	2
1959年	304	62	242	33	19	14	3
1960年	350	135	215	39	26	13	4
1961年*	285	70	215	28	17	11	3

* 根据 1961 年 2 月統計的数字

西鋪生产大队在貫徹执行党关于养猪的公养和私养并举的方針的过程中，曾經和各种錯誤傾向进行了斗争。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曾經有人打算将社員私人养的猪轉为公养。王国藩同干部、社員反复商量，一致认为，将社員养的猪轉为公养是違反党的公养和私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的。而且这样作問題还很多：一是大队沒有那么多飼料；二是大队沒有那么多猪圈；三是集体养猪的經驗还不足，发生疫病时，可能造成大量死亡；四是戶戶不能大量造肥；五是社



員也不願意。他們认为，大队一方面應該依靠現有的力量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另一方面應該积极鼓励和帮助社員家庭养猪。社員家庭养猪的好处很多：社員家里有人弄飼料，有現成的圈，有飼养經驗，有积极性，戶戶能造肥，还能解决各戶零用錢的問題。同时，实行社員必須完成基本劳动日的制度，也不会影响集体生产。于是他們决定在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仍旧鼓励社員私养，社員私养的猪一律不动。由于坚持了公养和私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便保证了养猪数量的繼續增长，全大队年年超額完成了国家的购猪任务(其中絕大部分是社員出售的)。一九五三年卖给国家生猪四十头，一九五五年五十头，一九五七年七十六头(公养六头)，一九五八年九十头(公养十四头)，一九五九年一百一十五头(公养十六头)，一九六〇年一百零二头(公养十二头)。

为了鼓励和帮助社員家庭养猪，西鋪生产大队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 尽力設法解决飼料問題。他們认为每养一头猪沒有百余斤粮食是不行的。为了解决飼料問題，队里按上級規定的标准撥給社員自留地(包括飼料地)，国家在收购生猪时，每头猪也供应了一定数量的飼料。

(二) 保证养猪的社員吃到較多的猪肉，按照上級規定，留給卖猪戶一定数量的肉票。

(三) 社員积的肥一般都按质論价，按月付款；生产队还負責給各戶的猪圈送土、起粪。

(四) 对一些想养猪但在經濟上有困难的社員，将大队猪場的小猪无利贈給他們，等他們卖肥猪后再还款。

(五) 实行了免費防疫制度。給各戶养的猪打防疫針；这项办法很受群众欢迎。

(六) 按人口留給社員的自留地始終坚持不变，同时督促社員按基本劳动日完成出勤天数，加强社員的思想教育，因而社員沒有发生只顾个人生产、不管集体生产的傾向。

此外，西鋪生产大队在发展畜牧业的过程中还貫徹了自养自繁的方針。他們认为不能伸手向国家要小猪和牲口，因为国家沒有那么多，即使有那么多，拿来也不一定适合当地的“水土”。因此生产大队的猪場主要是繁殖小猪，同时允許社員养母猪。自农业生产合作化以来，这里的猪和牛驴騾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自繁自养的。

与西鋪生产大队仅隔一条路、自然条件相同的东鋪生产大队，近几年来粮食生产和畜牧业有些下降。一九六〇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四百三十九斤，比一九五九年降低百分之十以上。总产量比一九五九年减少百分之五。这个大队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认真貫徹执行党关于养猪的公养和私养并举的方針，致使畜牧业沒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因而也影响了粮食产量的增长。

现在，西鋪生产大队在进一步貫徹党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項政策以后，大队集体养猪的积极性很高，社員家庭养猪的积极性也很高。有的社員正在忙着买小猪，不少社員在經過大队领导批准后，頂着月亮开“十边地”。生产大队准备根据社員要求分給社員一部分粗飼料，帮助沒圈的社員修圈，还准备抽一个較弱的劳动力，替社員放猪。看来这个大队的畜牧业还将更快地增长起来，粮食产量也将繼續稳步上升，粮畜相互促进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人民公社工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

李成瑞 左春台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广大农村中，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成了政社合一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农村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不同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兴办了大量的公社工业。一九六〇年，随着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在我国许多城市中，也办起了许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截至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根据大略的统计，全国城乡公社工业共有二十多万个单位（不包括生产大队的经营单位），其产值大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

我国人民公社工业在短期内获得这样广泛而迅速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社会经历了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产物，是由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由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在总路线的鼓舞下，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实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的跃进，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改造，要求大量制造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要求提供更多的土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要求建立排灌机械、拖拉机的修配行业。农村人民公社为举办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在原来已经开展的群众办工业运动的基

础上，公社工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农村中迅速地广泛地发展起来。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出现较晚，是在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创建发展起来的。在此以前，城市街道工业的发展，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邻里服务站的建立，国营企业开展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兴办“卫星厂”，特别是城市广大妇女群众要求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热情的空前高涨，所有这些，使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广泛发展成为不可避免。

人民公社工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规模还很小，生产水平还很低。生产条件，大部分是手工劳动，部分是半机械化，小部分是机械化。人们常常把公社工业叫做“小小工厂”。但是这类“小小工厂”，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分布广泛的、为数众多的城乡公社工业企业，加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公社工业在支援农业方面已经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县级国营工业一起，已经开始担当了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修配的主要任务。部分地区初步形成了农业机械的修配网，大体上做到了小修、中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仿制、改制和创制了很多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大量制造了镰刀锄头



农具。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約有一半是公社工业生产的，小农具大部分是公社工业生产的。許多地区在“向机械化要劳动力”的口号下，通过农机农具的制造和改革，收到了节省农业劳动力的效果。公社工业具有点多面广，直接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特点，能够适应当地需要，灵活多样，随試随制随改，及时生产，及时供应，深受群众欢迎。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人員和产值中，直接为农业服务的行业約占百分之四十、五十或者更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为农业服务的行业，在不同地区，分別占百分之五、十、二十、三十不等。

公社工业已經成为国营大工业的有力助手。它为大工业生产原料，加工零件、配件、半成品、包装用品，为基本建設单位采制磚瓦、砂石等建筑材料，利用大工业的廢料、廢渣、廢水、廢汽，加工为成品、半成品。許多公社工业已經成为大工业的“卫星厂”，成为大工业生产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人員和产值中，为大工业服务的行业約占一半左右；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中，約占百分之十到二十。

公社工业在增加市場貨源供应人民生活日用品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担負了小商品生产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担負了大部分修理服务业务，并且开展了农副产品的初步加工和綜合利用，从各方面增加市場貨源，供应人民需要，供应一部分出口物资。在城市和乡村公社工业的人員和产值中，为人民生活和市場服务的行业各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公社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积累和社員收入，壮大了社有經濟。公社工业的积累

在公社一級全部积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許多公社反映：办了工业，有錢买生产資料了，社員手头也活动了。在現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公社所有制虽然在整個公社經濟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正是这部分公社所有制代表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偉大希望和偉大前途。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使机器生产开始进入了农民的生活領域，打开了农民的眼界，它正在改变着农民的精神面貌，增强了农民建設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念。列宁曾經把每一个小型电站看作是教育农民的基地，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开始使用机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也正在起着这种作用。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家庭妇女，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設事业。“家家无閑人，人人有事做”、劳动光荣、互助友爱的良好風尚在城市中进一步树立起来。

人民公社工业广泛的迅速的发展，是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胜利，是党的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特别是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針的胜利，归根到底，是毛澤东思想的胜利。

我国的人民公社工业經過两年多以来的大发展，目前已經进入一个以巩固为主的时期。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在发展的基础上“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針，不仅适用于国营工业，而且适用于公社工业。人民公社应当认真做好公社工业的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作，并且努力促进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現在，我們来回顾一下两年来公社工业已經走过的道路，研究一下兴办公社工业已有的經驗。

什么是我国发展公社工业的主要經驗呢？根据我們的体会，大致有以下四条：第



一，要有明确的经营方针，即首先和主要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同时适当地为大工业和出口服务。这就是说，公社工业不能离开这些任务而片面地追求利润、追求产值，不能没有重点地百业俱兴，甚至轻重倒置，不能不顾实际需要和具体条件来制订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第二，要把公社工业在公社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摆得恰当。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要适应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适应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需要和可能。这就是说，不能采用削弱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和不适当地挤占农业劳动力的办法去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第三，要用适当的方法把公社工业同国家计划结合起来，把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同公社因地制宜的主动性、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各级计划机关对公社工业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统得过死。第四，要按照公社工业的特点，搞好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继续有效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坚持勤俭办企业，土洋并举，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说，既不能放松加强管理，又不能完全照搬国营企业的一套办法。

以上四条中，经营方针是最根本的一条。公社工业为谁服务，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这是举办公社工业的时候必须首先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第三、第四三条，也是发展公社工业必须正确处理三个问题，即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公社内部各级（主要是生产大队一级）和各业（主要是农业）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公社工业同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关系；一个是公社工业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只有坚决贯彻公社工业的经营方针，正确处理公

社工业上下、左右、外部、内部的关系，公社工业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才能巩固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公社工业的经营方针

人民公社工业，应当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出口服务。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和县城、集镇的公社工业，主要任务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主要任务是为人民生活和市場服务。两年多的实践证明：中央规定的这个被人们通常简称作“四为”的方针，是发展公社工业的正确方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的生存之本，衣食之源。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的发展才有可靠的基础，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更快地发展。搞好农业是我们发展工业、进行经济建设的立足点。按照农业发展的需要，大力做好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是整个工业战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农村人民公社工业是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农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同农业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只有把为农业生产服务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全心全意做好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作，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各种日用小商品的制造和修理服务业，同广大群众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锅盆碗筷，针线钮扣，发卡子，奶嘴子，鞋钉子，这些东西虽小，但不可缺少。各种日用小商品，除了一部分生产技术条件较高的产品要由国营企业生产以外，大部分生产任务落在公社工业特别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肩上。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在为大工业服务的同



时，必须以主要力量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有一个时期某些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中，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行业只占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这个比例显然是低了，目前已在设法增加。

公社工业是否正确执行党和国家规定的经营方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它是否以主要力量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四为”的方针是统一的，但是四者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以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为这方面服务得多了，为那方面服务得就少了。如何做到既保证重点又兼顾其他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规定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也就是要恰当地规定四个方面在公社工业从业人员和产值中所应占的比例。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中，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业一般应当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有些情况下，应当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中，为市场和人民生活服务的行业应当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两个比例就是公社工业经营上最重要的政策界限。目前有些地方的公社工业达不到这个比例，正在设法提高，这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三个方面应当在总比重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条件下，各占一个适当的比例。究竟各占多少，则要由各地按照当地具体情况来确定。若干地区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中，除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应占到百分之五、六十以外，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应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为大工业和基本建设服务的应占百分之十到二十；为出口服务的应占百分之一到五，传统出口商品重点地区比例还可以适当提高。公社工业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根据具体条件开展各项经营，又要适当缩短战线，保证重点。

在公社工业同国营大工业之间，在农副产品原料的分配上也存在着矛盾。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工业原料，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用得多了；供给城市国营工业的就少了。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这也是在执行“四为”方针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原则应当是：凡是国营大工业加工能力有余力，原料便于长途运输，产品供应较大地区需要的，应当尽先供给国营大工业；凡是国营大工业加工能力不足的，原料不适于长途运输的，产品供给公社内部和当地人民需要的，应当留给公社工业就地加工。例如，棉花、麻类、皮革等原料属于前一类，应当供给国营工业，公社不要举办土纺、土织、制革等工业。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如多种高粱制糖、制饲料），农村消费的粮食、油料等的加工，若干野生植物的初步加工（如野生纤维脱胶、野葡萄制酒）等等属于后一类，应当尽可能由公社工业来办，一般不宜由国营工业来办。还有些农副产品原料，可以先由公社工业粗制，然后运往城市由国营工业再加精制（如草类和木材，先由当地公社加以采集，制成粗纸浆，然后由国营工业制成细纸浆），可以大大减少原料材料的重量和减小体积，节省大量运输力。公社工业同国营工业这样合理分工，公社工业就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向着自己的广阔的领域里去发展，不仅不会同国营工业争原料，闹矛盾，而且可以同国营工业更好地互相支援，互相促进。

贯彻执行“四为”的经营方针，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过去一个时期，有一部分公社工业人员有所谓“三千三不干”的思想：愿干产值大、利润多的，不愿干产值小、利润



少的；願干成批生产的，不願干零星的；願干制造，不願干修理。社員群众对这种不正确的經營思想和作法已經表示了他們正当的責难。公社办工业要求有一定的利潤和积累是应当的，但是决不能脱离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片面追求利潤。产值是反映生产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增加产值是一件好事，但是，檢查公社工业生产，应当同时以品种、产量、质量等指标为标准，不能只看产值，不顾其他。当前公社工业的主要任务，是制造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大量需要的产品（如鋤头、鑿刀、改良农具和鍋碗盆勺之类）和开展修理、服务工作，这也是一般公社工业所能胜任的。不顾公社工业当前的具体条件，看不见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中的迫切需要，是缺乏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具体表现。总之，必須經常地反复地加强对公社工业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国民經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加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教育，才能正确执行公社工业的經營方針。

农村公社工业在公社 经济中的地位

摆好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在公社經济中的地位，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公社各級（主要是生产大队一級）的关系，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各业（主要是农业）之間的关系，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贯彻执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關鍵問題，也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健康发展的關鍵問題。

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級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生产大队是

独立經營单位，是基本核算单位。农村人民公社中的任何工作，都必須严格遵守这个根本制度，才有利于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和各項生产事业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举办的工业，如果需要使用生产大队的資金和材料，必須按照自願两利、等价交換的原則办事，决不能像国营企业内部那样实行无偿調撥，以至損害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則。我国农村創办公社工业，資金、設備和劳动力，大体有这样几个来源：（1）原有企业的底子，包括乡办工业的底子，一部分基层手工业合作社的底子，县里下放企业的底子，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开始建立的基础。（2）国家的支援，包括財政的投資，国家供应的某些設備，通过厂社挂鈎由国营企业单位支援的設備，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建立和发展中設備和資金的一个重要来源。（3）农村人民公社自己的积累，包括社办企业本身的积累和按照規定从生产大队提取的一定比例的积累。公社工业本身的积累，是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經常的、根本的資金来源。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只有建立在本身积累的基础上，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会成为开不败的花朵。

在一个农村人民公社之内，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級的工业和副业，应当根据集中和分散相結合、骨干和一般相結合的原則，通盘规划，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公社一級应当集中力量办好那些为全社服务的、所需設備和資金較多的、骨干性的企业。凡是适于生产大队分散經營的企业，都应当由各个生产大队自己去經營，而不应当过多地集中到公社来办。生产队則要利用农閑进行一些小型的副业經營。以农具制造和修配为



例，农业机械的修配和新式农具的制造一般应当由公社一级来办；一般农具的修配和小农具的制造可以由生产大队来办；而生产队则应当有一盘铁匠炉，能够进行简单的农具制造和修配。这样，三级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机农具修造网，就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更加便利群众。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可以由公社单独投资举办，可以由公社和生产大队共同投资举办，也可以由几个公社联合投资举办。凡是公社和生产大队共同举办的企业和公社联合举办的企业，都应当签订合同，保障各方享受合同规定的权益，分取应得的利润。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必须适应当前农业生产的水平，既不能落后于当前农业发展的要求，又不能超越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客观可能，这是举办公社工业的另一条重要原则。马克思说过：“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外，能够生产多少农作物。”^①这就是说，从农业人口中抽调多少劳动力从事工业，主要地不是决定于发展工业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而是主要决定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虽然比旧中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很低的，耕作主要还靠手工劳动和畜力，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还不高。因此，第一，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占用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总数中的比例，目前还只能是比較低的。第二，必须实行中央提出的亦工亦农的政策，除了少数必须常年经营的工业以外，一般应当是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不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

那么，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比例究竟以多少为合适呢？根据许多地区两年来实践的經驗，在目前情况下，社办企业和其他事业，除了尽先使用城镇的非农业劳动力以外，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一般地不要超过生产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生产大队兴办的企业和事业，从生产队占用的劳动力，一般地不要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把公社和生产大队举办的企业和事业所占用的劳动力控制在这样的比例以内，再加上林业、牧业、渔业和副业等方面所占用的劳动力，总共不超过农村全部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才能保证使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比例是适当的。过去我国农村没有或很少工业企业，没有或很少工人，这是经济落后的标志之一。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以来农村兴办公社工业，农村中工人迅速增加，是必要的。但是，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从业人员，曾经发展到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三点五左右，而且大部分是常年固定工人，这就有些过多了。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各地方已经开始加以适当紧缩，特别是把许多常年固定工人转为季节性工人，把农村劳动力更多地使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今后相当时期内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从长远看，农村人民公社中从事工业的人员肯定还要增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要做到这一步，还有待于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工业集

^①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中力量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业办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然后使农业有可能腾出劳动力来进一步加强工业，这是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壮大公社工业职工队伍的正当途径。

正确处理公社同各级和各业之间的关系，归结到一点，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适当。消极保守，能办不办，使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落后于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可能，是不对的；不顾条件，贪大图快，使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超越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客观可能，也是不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掌握得适当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在公社经济中的地位就容易摆得适当了。

把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 适当结合起来

为着保证公社工业“四为”方针的圆满实现，必须把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适当地结合起来。公社工业是集体所有制的（虽然许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具有较多的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它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公社工业一般又是小型、分散、灵活、多样、季节性强的，它不同于大中型的、比较集中和全部常年生产的企业。这就决定公社工业经济活动和计划工作的方法要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在经济计划中，不论对于国营企业和公社工业，都要实行统一的计划性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都要实行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条条（各部门）和块块（各地区）相结合的原则。但是，由于公社工业存在着上述特点，对于公社工业的计划

领导要更多地注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更多地依靠分级管理，实行块块为主的办法。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结合的形式要多种多样，并且要通过供应原料材料、统购和包销产品、合理确定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以及国家有计划地进行援助等方法，实现国家对公社工业的计划领导。

公社工业不能像国营企业那样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的结合可以有这样几种形式：由商业部门加工订货或者统购包销的部分，可以通过商业部门的供、产、销计划同国家计划结合；为大工业承制加工的部分，可以通过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同国家计划结合；有些重要产品如煤、铁、纸、糖等，可以由国家主管部门适当地纳入本部门的计划。而所有这些计划，都应当由各级计划机关加以汇总，进行全面的综合平衡。

公社工业的供、产、销都要同国家计划适当结合。对于那些必须由国家供应某些原料材料才能进行生产的公社工业来说，供是关键，供的问题不解决，产销计划就会落空。公社工业的原料材料绝大部分依靠就地取材，在不影响国家统购物资的收购，不和国营企业争原料的前提下，公社工业依靠自己，逐步建立和发展原料材料基地，这是公社工业解决原料材料问题的基本途径，离开这个基本途径，过多地伸手向国家要东西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许多公社工业也需要一小部分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主要是钢材、有色金属和某些化工原料，要靠国家有计划地供应。例如，修理农业机械和制造各种农具，需要一定规格的钢材和机器零件，制造各种日用品，水壶要有黑白铁皮，发卡子要



有鋼絲，奶嘴子要有橡膠，小五金電鍍要有鹽酸，等等。這些原料材料雖然需要的數量不多，但是缺少這些原料材料，生產就不能進行，因此國家按照計劃適時地給予供應是必要的。利用大工業的邊角廢料，也是公社工業的一個重要原料材料來源，今後，在這方面應當保持和恢復傳統的協作關係，凡是宜於由公社工業利用的邊角廢料，應當盡先供給公社工業。

合理的价格政策和稅收政策，是國家對集體經濟實現計劃領導的一個重要工具。公社工業的產品收購价格和稅收政策，應當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和保持市場物價的穩定，有利於使公社工業的發展同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要求相適應。目前有些地方的問題是：為大工業服務的行業，產品收購價和加工費偏高，利潤偏大，而目前急需發展的行業，如農機農具的修配製造，小商品生產和修理服務業，利潤反而偏低，有的甚至沒有利潤，這種情況是不利於公社工業貫徹執行“四為”方針的，應當加以改變。最近許多地方已經着手根據國家計劃的要求和公社工業“四為”的方針，從原料材料价格、產品收購价格和國家稅收等方面加以調整，把偏高的適當調低，把偏低的適當提高，使各個行業都能得到應得的利潤，這是完全必要的。

國家對公社的支援和幫助，要有計劃地進行。財政投資和銀行貸款的重點應當放在為農業生產服務和為人民生活的行業，並且要同國家物資供應計劃相銜接。廠社掛鉤，應當以技術支援（傳授技術，幫助修理等）為主，支援動力設備和機械設備要列入國家計劃，並且由公社照價付款。

加強公社工業的企業管理

為着保證公社工業“四為”方針的圓滿實現，還要按照公社工業的特點，正確處理公社工業企業內部的各種關係，搞好企業內部管理，堅持勤儉辦企業的方針，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

公社工業企業同國營工業企業都是社會主義企業，都應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和廠長負責制、“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合理的工資待遇制度，都要有效地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有領導地開展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都要實行嚴格的經濟核算，努力降低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防止人力和物力的浪費等等。但是，公社工業企業的經營管理在具體做法上又必須適合自己的特點。

農村人民公社工業經營管理必須根據農村環境的要求，一般地實行季節性生產，農閑做工，農忙務農（少數常年生產的企業除外）。這不僅是目前節約勞動力的潛力所在，而且對於今後長時期內逐步縮小工農差別也有重要的意義。農村公社工業企業在勞動力的使用上大體是這樣的：有的基本上常年做工，特忙時抽個把月務農；有的三分之二以上時間做工，在大忙時抽兩三個月務農；有的半年做工，半年務農。實行亦工亦農要有適當的形式和制度。從現有經驗看，有以下几种形式：一種是廠隊掛鉤，固定支援對象，農忙時有組織地下去，農閑時有組織地回來；一種是按照農活需要，臨時確定支援對象，也是有組織地來去；一種是工業單位自己兼辦農副業，設立蔬菜場、养猪場、家禽場、飼料場。具體形式可以因地制宜，多種多樣，但是，不



論采取什么形式，都要注意这样一条原則，即是既要最大限度地發揮支援农业的作用，又要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工业技术的稳定和提高。由工入农，由农到工，都要有組織有秩序地进行，有技术的职工不要輕易更換，防止不必要的波动。同时还要合理地解决工人参加农业劳动的粮食供应、工資福利、收益分配等問題，既要使工厂乐于支援农业，又要使生产队乐于吸收工人参加劳动，力求做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工厂、工人五个方面都滿意。

城市人民公社工业要适应这些企业以家庭妇女为主要成員的特点，注意保证妇女出勤所必需的各项福利設施（托儿所、公共食堂等），注意工作時間不要过长，使她們有适当的时间进行学习和从事必要的家务劳动。有些地方实行“六、二”制、“七、一”制，即每天六小时或者七小时工作，二小时或者一小时学习，效果很好，深受男女职工的欢迎。

目前公社工业的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公社职工的工資也应当适当从低。在城市，应当适当低于当地地方国营工厂同行业同工种的职工的工資水平。在小城镇和农村，技术熟练工人的工資，应当适当地高于农民。公社工业的干部应当比国营企业的干部更多地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做到是干部，也是工人，力求减少脱离生产的管理人員，力求降低成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不論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或者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都应当从实际出发，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提高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修理服务质量。

勤儉办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經營管

理的一条根本方針。我国城乡公社工业，就是在这个方針的指导下創建和发展起来的。应当教育公社工业的全体职工，坚持和发揚克勤克儉、艰苦奋斗的作風，公社工业才能得到不断地巩固和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些公社工业，在生产有所发展、积累有所增加以后，有一部分干部又开始滋长了讲排場、鬧闊气的鋪張浪費的風气。这种現象虽然是很少数的，但是必須及时加以糾正。

公社工业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領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公社工业建立不久，干部不足，絕大多数干部缺乏領導企业的經驗，同时在公社工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单位中出現了領導成份不純的現象。因此，必須加强党对公社工业的領導，加强党在公社工业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克服各种資产階級思想，进一步树立全局观点和計劃观念，进一步树立深入調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風，进一步树立有事同群众商量，同群众同甘共苦的群众路綫的作風。对于那些領導成份不純的企业，必須結合整風整社，通过群众运动及时处理，使那些觉悟高、成份好、作風好、工作踏实的积极分子掌握企业的領導权，保证党在公社工业中的絕對領導。改善經營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作，而是一个端正經營作風、提高管理水平的細致复杂的組織工作。为此，必須坚持政治挂帅，发动和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为了加强对公社工业的具体領導，最近許多地区正根据国务院的决定，积极建立和加强人民公社工业的管理机构。这是保证公社工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努力提高轻工业产品质量， 满足人民需要

· 陈克奇 ·

上海市是我国轻工业的老基地之一，生产的轻工业品有三千多个品种，二万多种花色，产品行销全国许多地方，一部分还供应出口的需要。大跃进以来，上海市轻工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积累了一些经验。一九六〇年，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上海市轻工业企业，积极采用和推广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加强了技术管理，深入开展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的群众运动，使轻工业品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一九六〇年底对一百一十五种主要产品的调查统计，产品质量稳定和高的占百分之八十七，其中八十一一种产品的质量，已经接近或者赶上国内外的先进水平。这一年来，有七千八百多种新产品、新花色投入生产，其中高级、精密的产品就有三百六十六种，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将近五倍。可以说，上海市轻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矛盾统一两个方面。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日用轻工业品的原料材料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来自农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料材料消耗，也是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农业原料的一个重要

措施。中共上海市委一再指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从各方面挖掘工业的潜在力量，使一份材料抵几份材料用，一件产品抵几件产品用，一个人抵几个人，一个厂抵几个厂。在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市的轻工业企业，不断地向广大职工群众进行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教育，以求全面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同时又不断地对轻工业产品进行分析排队，调查研究产品质量上存在的问题，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检查对比，交流经验。

在上海市的轻工业企业中，有些同志曾经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只看到本企业产品的产量、质量的提高，而没有看到其他先进企业比本企业进步得更快，更没有看到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轻工业的要求不断提高，因而产生骄傲自满思想；另外有些同志，看到本企业的设备比较陈旧，原料材料的供应还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对提高产品质量缺乏信心，在困难面前产生畏难情绪。这两种思想对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都起着不利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轻工业的各个企业，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紧密结合生产运动，大讲形势，大讲任务，深入进行总路线的思想教育；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揭发产品质量上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进的措施。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通



过开展提高质量的群众运动，上海市轻工业企业的广大职工，觉悟大为提高。他们鼓足干劲，树立起力争产品质量第一流的雄心壮志，加强了多快好省的全面观点，克服了在部分同志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思想和畏难松劲情绪，研究出解决质量关键问题的具体措施。“雄心加措施，力争第一流”，已经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行动口号。

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中，各厂普遍发动群众，采取“听听、比比、议议”的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使每个职工不仅了解产量指标，而且了解每一产品的质量要求和规格标准，从而使人人关心产品质量；力争做到高产优质。为此，许多轻工业行业和企业搜集了大量的国内外产品的样品和资料，举办产品质量展览会，进行广泛的访问活动，把本单位的产品的质量情况同国家标准和各方面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在扩大眼界、明确方向的基础上，组织职工进行“想人家，比自己，找问题，查原因”的议论，树立大志，制订提高产品质量的规划，提出切实的措施。这种议论，既是检查和研究改进产品质量的过程，也是反复进行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教育的过程，又是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一起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这样，在不断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的同时，也找到了提高质量的途径和有效方法。

一年来，上海市不少轻工业工厂，组织了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队伍，到用户、商业部门、兄弟地区和兄弟厂，以召开用户座谈会、产销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了二千多次访问活动。在这期间，还举办了各种规模的产品质量展览会、质量评比会

和鉴定乐器、运动器具等产品质量的演奏会和表演会等达五百多次。日用轻工业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实际使用的需要，用户是产品质量的最后检验者和鉴定者。生产单位同使用单位等各方面经常保持联系，把日用轻工业品的质量置于广大消费者监督之下，就能够经常了解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激发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的劳动热忱。

上海市搪瓷工业通过质量对比展览会，进行自我教育，从而提高产品质量的事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上海市搪瓷工业中有些厂，原来把产品质量赶不上兄弟地区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煤质差，硼砂、粘土等原料材料的规格、数量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等客观条件。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开展的“力争产品第一流”运动中，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这些厂搜集了全国质量第一流的西安人民搪瓷厂的产品，同上海市搪瓷产品一起举办了质量对比展览会。通过参观，组织讨论，看到上海市搪瓷产品的光泽、白度、细腻等方面都赶不上西安的搪瓷产品；同时也看到某些厂的试制小样已经赶上西安的搪瓷产品的水平，因而改变了原来不正确的想法。搪瓷工业广大职工提出“大战一月，决心赶上西安”的口号，一方面由领导人员和工人、技术人员组成三结合的队伍到西安“取经”；一方面，各厂开展“比志气、比操作、比质量”的大竞赛，各工段、小组都在详细检查自己操作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制订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具体措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各个搪瓷工厂中贯彻执行了一百多条重要措施，使产品达到全国先进的水平。



要提高产品质量，除了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外，还必须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和复杂的技术工作。轻工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大、品种多、工艺复杂、协作面广。从原料投产，经过每一道工序的加工，再到装配，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产品质量的问题，每一个环节的处理是否得当，都会影响产品质量的好坏。要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不仅需要成品进行严格检验，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改进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道生产工序的加工质量；不仅需要发动主要工种工人革新技术，而且要求全体职工，包括运输、储存以及其他各种辅助工种工人，全面地改进工作；不仅要发动工人群众提高技术操作水平，而且还需要相应地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管理工作水平。因此，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和调查研究工作，一定要结合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不同工种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造成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人人关心产品质量，道道工序把关，针对产品质量上存在的问题，献计出谋，从各个方面来保证产品质量的提高。从上海市的实践经验来看，主要抓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必须从原料材料的处理抓起，只有原料材料的质量提高了，加工产品的质量才会有保证。投料是任何生产过程的第一步，也是保证产品质量的第一道关。原料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符合产品制造的要求，才能为整个加工过程提供有利的物质前提。上海市轻工业在持续跃进中，原料材料的供应，在品种、规格上，有时不能满足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的要求，对产品质量的

稳定和提高，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根据产品质量的要求和原料材料的变化，积极采取措施，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高。上海市轻工业在一九六〇年中，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劣煤烧高温”、“次料生产好产品”等提高产品质量运动，使土草浆、废次钢材、土铁、次煤等次级原料和燃料，生产出质量较高的白纸、包装纸、日用金属制品等产品。在具体做法上，我们一方面加强原料材料的管理和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根据可能条件，大力增产各种专用原料材料。

加强原料材料的管理工作和合理利用原料材料，是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轻工业品的原料材料，规格性能多变，要正确了解它的性能和特点，就必须认真加强原料材料进厂和投产前的检验、化验工作。对一些应该分等使用的原料材料，采取分档分级、量材加工的办法使用，坚持优材优用、大材大用、专料专用的原则。对规格品种不合格的原料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后，可以符合产品物理性能或化学性能要求的，坚持先处理，后投产。原料材料经过处理，改变了它的原有规格和性能，不仅限制了它对产品质量发生不利的影晌，而且从中摸到经验，进而有利于改进产品质量。上海市钟表工业把延展性很差的硬性铁皮，经过多次冲压、回火等措施和多次拉伸试验，改变了原来的性能，不仅保持了闹钟的质量，而且逐步掌握了硬性铁皮的加工工艺，进一步提高了闹钟的质量。在原料材料的发展不能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情况下，通过改进工艺、改善操作来提高原料材料的性能，这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的一个有效方法。工人们



說得好：“三分原料，七分操作。”

对輕工业产品质量有关的专用材料，应当根据可能条件，大力进行增产，大搞多种經營，补充原料材料的缺門。几年来，上海市輕工业共有六十六个单位組織了原料材料生产，为二百多种輕工业产品提供了部分必要的原料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分配物資的不足，滿足了对原料材料数量的要求。其中有許多还是生产所必需的关键性原料，如钟表工业的发条，造纸工业的燒碱和液氨，制笔工业的鐵粒，鞣革工业的紅矾，日用刀剪工业的合金鋼，日用化妆品工业的硬化油等。此外，在一九六〇年中，上海市輕工业还利用廢料、廢水、廢气，生产和提取了鉻酸等一百零一种日用輕工业品的原料，也大大有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不断革新技术，是充分发掘生产潜力，把产品质量推向更高水平的犀利武器。产品质量是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产品的质量总是根据每一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要求和生产水平来制訂的。要提高老产品的质量，对老产品进行改型，使它的效能增加；要試制和生产新产品；要对規格不符合要求的原料材料进行加工、改制，以及創造和采用产品质量的檢驗仪器和工具，提高檢驗和鉴定水平等，都要求从各方面革新技术，改革旧工艺、旧技术、旧設計，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設計，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一九六〇年以来，上海市輕工业企业不仅努力提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程度，同时也把提高原有产品的质量，增加新花色、新品种，作为技术革新、技术

革命的主要内容。一九六〇年，上海市輕工业企业实现的革新技术的项目中，有一万多项是直接有关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的。这些项目的实现，使企业增加了对低次材料的处理能力，提高了設備和工夹模具的精密度，推行了强化化学反应等新工艺、新技术，改善了操作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如香精香料的凝固点和温度，金笔笔尖的圓滑度和漏水温差，紙張的光洁度和拉力，钟表、照相机等日用金屬制品的精密度，都有显著的提高。我們在具体做法上，首先对产品作全面排队分析，针对质量上的薄弱环节，发动群众，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分期分批地加以解决。排一批项目、攻一批项目，檢查一批、再排一批、再攻一批，做到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上海市金笔制造工业，几年来組織各厂排出了十个重大质量关键問題，集中全行业的老工人和革新技术的积极分子，組成专业的技术队伍，协同各厂的有关人員，分头研究。經過一段时間的反复試驗，实现清洗水箱的新工艺和开深环槽等革新措施，彻底解决了上海市制笔工业三十年来长期存在的漏水温差問題，做到了温度相差摄氏四十度以上而不漏水，达到了先进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試制成功在三千公尺高空不漏水的高级金笔。为了解决笔尖圓滑度的关键問題，又經過几百次試驗，采取許多措施，跳出了手工操作的旧框框，实现了磨笔尖的新工艺，使笔尖圓滑度由三面好写提高到四面光滑，五面好写。

在革新技术的过程中，我們对每一项新工艺、新技术、新配方、新設備和新产品，



都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任何一项新技术，从创制到使用，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在普遍推广时，也要结合具体条件（设备、技术等）逐步进行，方能取得实效。通过革新、总结鉴定、改进提高，再革新、再总结鉴定、再改进提高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我们才能逐步摸索到技术发展本身的规律，使每一项技术的革新，都能真正在生产上开花结果。以上海自行车二厂为例。这个厂生产摩托车，从试制成功到投入生产，经过了以下的步骤：先将试制成功的摩托车，装配五辆，作出初步总结鉴定，并加以改进；又试装二十五辆，再进一步鉴定，并经过实地行驶，然后再总结提高，成批投入生产。由于经过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摩托车的质量不断提高，性能愈来愈好。

经过革新所实现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料、新产品，都是能够提高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的。但是如果工人没有掌握与之相适应的操作技术，这些革新的技术还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操作，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技术内容，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断改进操作技术和提高操作水平，才能够保证提高产品质量。一九六〇年，上海市轻工业企业各级党组织，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提出了“人人掌握新技术，个个跨上千里马”的口号，并且以业余学校为基地，进行系统的操作技术知识的教育，广树标兵，组织先进生产者进行技术表演赛，互相交流经验，订立师徒合同，包教包学，先后组织了十万余次大小规模的技术

操作的“练兵”活动，对提高产品质量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广大群众很欢迎这些形式多样的“练兵”活动，他们说：“大家总结大家谈，大家表演大家看，互为师徒互相学，既取经来又传宝”。

第三，实行产品质量分级管理、层层负责、人人把关，加强设备维修，贯彻质量管理“以防为主”的方针，是巩固和扩大提高产品质量群众运动成果的重要环节。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在管理制度上，分级管理，层层负责，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加强集中管理；既要小组管理为基础，又要加强专业科室的指导作用。我们将产品按名牌、主要、重点、一般等进行分类，在改变配方、变更工艺方面，确定分别由局、公司和生产厂审批的权限和产品质量检验的职责，加强了对产品质量的集中管理。由于不少轻工业的原料和成品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加上工艺复杂，划分较细，不合格的零件和在制品，在加工过程中被及时发现，往往可以重行处理等，因此在加强集中管理的同时，发动群众人人把关，“以防为主”，就显得特别重要。

小组管理是群众管理的基本形式。上海市的许多轻工业工厂，在提高产品质量的运动中，加强了小组对产品质量的管理。不论是原料材料、在制品、半成品或者成品，在小组中都要进行质量检验工作。在小组中，还建立了产品质量分析制度、质量统计制度等。这就使小组成为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的基点。每个小组的成员都参加质量管理，使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小组每个成员既是生产工人，又是质量管理员，边生产，边检验。不少轻工业工厂还推行了群众性的



提高质量的生产鼓动制度，经常提醒工人注意产品质量，从而大大降低了产品废品率、退修率。工人們的体会是：“过去干活闷着干，合格不合格心中无数，等到檢驗員发觉了，已經做出了一大批不合格品，有的送走了再退回来，搞不清是誰做坏的，也不知道是怎样做坏的。現在自己負責檢驗，有了問題立即想法解决，廢次品就少得多了。”广大群众加强了对提高产品质量的責任心，反过来又有利于小組根据具体情况，修訂和健全提高产品质量的制度。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管理制度，也就更能为群众自觉执行和不断发展。

小組管理和专职管理必須互相結合。加强了小組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工作，使质量檢驗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就能够使专职檢驗員在工作中爭取主动，更好地提高檢驗工作的质量，并且帮助工人解决生产中的质量問題。上海市許多輕工业工厂的专职质量檢驗員，在群众性的质量檢驗工作开展以后，也采取了“变堵为防，变堵为帮”的方法，开展了抓标准、抓措施、抓分析、抓宣傳、抓評比的“五抓”运动。在自行车、钟表、照相机等金屬制品行业中，专职檢驗員对关键性冲压等工艺，实行首件檢驗，对組合完工的部件，則进行逐件檢驗。在日用化学制品行业，专职檢驗員着重抓抽样化驗，并主动到小組进行巡迴檢驗，結合生产工人的自檢、互檢制度，发现先进，及时組織交流經驗，发现质量問題，随时帮助工人解决，工人遇到有质量問題时，也主动找他們商量。这样，质量檢驗員既是檢驗員，又是宣傳鼓动員，既担任檢驗工作，又組織技术交流，把

质量檢驗工作做活了。

产品质量的提高，要求大力加强技术后方。在上海市輕工业中，有不少行业設備比較复杂，产品变化快，要求工夹模具数量大，精密度高，因此，加强技术后方，健全設備維修制度，也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們在加强专业的維修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群众的維修队伍。这两者的結合，保证了設備正常运轉和工夹模具应有的精度。几年来，上海市輕工业已經拥有三十个設備修造厂，二十多个模具厂，有专业修配人員五千三百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維修队伍。大部分工厂也設有專門的修理車間或維修小組。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广大生产工人中形成了一个“操作什么，会修什么”的学做多面手的运动，大兴群众保养設備之風，并使之形成定期大修、中修、小修等維修保养的制度。很多工厂不但注意了設備的保养和維修，建立了制度，而且还貫徹了“小修不出車間，中修不出厂”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保证了設備維護工作的及时性和經常化，有力地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

爭取工业产品的质量 and 品种方面的跃进，是工业战綫上今后两三年內的一項主要任务。我們上海市輕工业职工將坚决貫徹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已有的成功的經驗，大大提高輕工业品的质量。我們有这样的志气和决心，不但在产品的数量上，而且在质量、品种上，为滿足人民生活 and 国民經济建設的需要，做出更大的成績来。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上海市輕工业局局长）



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南斯拉夫农业

廖原

铁托集团一贯说他们正通过什么“独特道路”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他们自称选择了一条“建立现代化大型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道路”，吹嘘说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事实真相如何呢？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原有六千八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拥有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六和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从一九五三年起，铁托集团大批解散合作社。一九五三年三月，铁托集团颁布“关于合作社财产关系和改组农业生产合作社法”，任意解散合作社，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和雇佣劳动等。卡德尔在《论我国农村政策中的某些问题》一文中，露骨地提倡在农业中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说什么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第一个原则是：“使农业摆脱行政领导因素，并把农业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一九五四年四月，铁托在一次讲话中说，南斯拉夫政府“从上到下的政策必须是支持个体农民”。铁托集团否定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合作社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铁托在同一篇讲话中说：“在农业发达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作

形式。这些形式对我国社会也是有益的。”一九五五年七月，他在对美国“埃迪·薛伍德”研究班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在思想上不放棄有一天在南斯拉夫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并且在这方面寻求一个‘对立双方共同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铁托集团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和措施，使南斯拉夫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完全垮台。目前，在南斯拉夫农村中，个体经济拥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正在蔓延滋长，农民已经在向两极分化。

在南斯拉夫，由于土地是自由买卖的，富裕农民可以合法地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并且可以把比较贫瘠的土地卖掉，买进比较肥沃的土地。许多贫苦农民无力经营自己的土地，不得不把土地卖掉。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三日的南斯拉夫《战斗报》写道：“近几年中，在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土地流通相当活跃”，“在某些地区”，农民“越来越多地要出卖土地”。

农村阶级分化的状况，从土地分配的數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八年，个体农户从一百九十六万多户增加到二百三十三万多户，增加了三十七万多户，其中，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增加了



三万七千多户，而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却增加了二十六万八千多户，为前者的七倍多。一九五八年，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共占个体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但他们占有的土地，仅占个体农户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而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个体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却占有个体农户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九。这些数字表明：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大多数人正在贫困化，他们只占有很少的土地，而能够上升为富裕农户、占有较多土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个体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是铁托集团把南斯拉夫农村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有力证明。

富裕农民还可以通过租赁土地，扩大自己的耕种面积。根据《南斯拉夫一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号的材料，一九五六年个体农户共出租土地三十七万公顷。出租土地的原因，大多数是由于力量薄弱，劳动力、耕畜、农具不足。这些出租的土地，大部分为富裕农户所租去。《战斗报》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说：“某些农业生产者耕种着几乎超过土地最高限度**一倍的面积”，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增加了一倍”。

南斯拉夫很大一部分农户缺少耕畜和农具，如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百分之四十三的农户没有耕畜，百分之五十三的农户没有犁耙。拥有较多的耕畜和农具的富裕农民，不仅可以租种那些自己无力耕种的农户的土地，而且可以把耕畜、农具出租给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户，进行剥削。

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明显标志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发展。据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的《共产主义者》周报报道：一九

五六年，在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都雇佣劳动力。他们剥削的对象，是那些缺少生产资料的农业劳动者。

在南斯拉夫，依靠放高利贷发财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解放报》说：在“某些地区，仍然出现了一些旧高利贷者”。这家报纸举例说：托博依县泽列尼卡村的奴伊奇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两年中，放出的高利贷有六百万第纳尔现金、五千八百多公斤粮食和一千五百多公升白酒，利率最少是百分之十，多的超过百分之百，榨取利息达五百多万第纳尔，有七百八十户农民欠他的债。报纸还说，“如果不及时报还债，他就在家门口出卖负债农民的最后——头乳牛”。

铁托集团一方面大批解散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又吹嘘他们的所谓“综合农业劳动合作社”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其实，这种合作社完全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农业组织。

经营商业，在“综合农业劳动合作社”的业务中占有最大比重。合作社利用农产品自由贸易和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一方面剥削农业生产者，另一方面剥削城市消费者。如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抬高农产品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农产品收成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同个体农民进行生产上的所谓“合作”，

* 据《南斯拉夫一瞥》1959年1月号材料，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一般是缺粮户。

** 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每户占有土地最多不得超过十公顷（土地贫瘠地区为十五公顷）。



也是“綜合农业劳动合作社”的一项业务。合作社同个体农民签订合同，代个体农民耕地、播种、收割、运输等等，或者是租种、包种个体农民的土地。个体农民则根据合同给合作社以报酬。这种“合作”的情况是很不妙的。许多农民在同合作社的“合作”中欠了债。据一九六〇年十月六日的《共产主义者》周报报道：和合作社合作的农民总共只有五十多万户，他们欠合作社的债务达一百三十六亿五千多万第纳尔，其中到期未还的债务超过了七十亿第纳尔。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生亏损的情况也不少，这当然是违反铁托集团的愿望的。在这种情况下，铁托集团的宣传机关公然鼓吹合作社不要同贫苦农民合作，而应当只同富裕农民合作。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战斗报》以南斯拉夫产粮地区奥西耶克县的情况为例写道：“在奥西耶克县，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只占有三公頃以下的土地。”“事实已经证明，在合作农民中间，大部分农民的全部产量，仅够家庭食用，他们没有剩余来出售，也没有剩余偿还债务”。这家报纸以富农阶级代言人的语调说：“和这些不生产商品的生产者进行合作，会有什么结果？是否要在他们本来不可能正常维持生活的土地上免费保证他们的生活呢？这样对谁有利？”这家报纸的结论是：“同比较稳定的农民（按指富裕的农民）建立合作是更赢利和更合算的”。

合作社还经营自己的农场，从事部分的农业生产。这种农场，也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它们雇用工人为他们生产利润，并普遍向个体农民购买或租种土地，扩大耕地面积。一九五九年，合作社雇用固定工人六万八千多名（农忙季节还雇用许多临时工人）。农场之间有着剧烈的竞争。那些经济力量较弱、

生产成本较高的农场在竞争中敌不过那些经济力量强大的农场，往往弄得亏本、倒闭或被后者所吞并。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很坏。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的《经济评论报》说，由于农场情况恶化，“占百分比很大的农业工人仅领到最低限度的个人收入”。许多工人难以维持生活，只好流亡到城市谋生。

南斯拉夫这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合作社，给富农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活动场所。富农逐渐把持合作社的经营大权。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经济政策》一书记载：一九五六年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中，占有两公頃以下土地的农民所占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五点三，而占有八公頃以上土地的农民却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新闻周报》报道了一个“亏损的合作社”的情况，这个社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和会计、出纳、收购员等重要职务大都由富农把持，他们在半年内就使这个合作社损失了将近六千万第纳尔。

这种“綜合农业劳动合作社”由于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合作社的数目和社员人数不断减少。据《南斯拉夫一瞥》一九五九年六月号所载，一九五〇年这种合作社有八千零四个，社员三百五十四万人，一九五八年社数减少到五千一百九十七个，社员减少到一百三十七万人；又据南斯拉夫通讯社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报道，社数在一九六〇年只剩下不到四千八百个了。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近十年来，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已经把南斯拉夫的农业引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铁托集团的所谓“独特道路”，其实只不过是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罢了。

